

# 《南风窗》岁末特刊 独家策划

## 2009 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

<b>年度人物:</b> .....	1
艾未未: 知识分子新标杆.....	1
胡舒立: 传媒变革的先行者.....	2
伍皓: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4
何道峰: 理想在世俗的泥泞中演进.....	5
秦晓: 超越利益囿见的批判者.....	7
谢辰生: 古城保护者的坚强后盾.....	8
罗崇敏: 推进现代教育公平.....	9
王长江: 呼吁民主和政改的智囊.....	11
陈发树: 散财的烦恼.....	14
<b>年度机构:</b> .....	16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 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16
全国人大财经委: 经济“守夜人” .....	20
慈济: 台湾民间力量典范.....	24
NPI: 架设公益桥梁.....	27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不唯学术, 锐意争鸣.....	29
广州市财政局: 预算公开只是开始.....	30
人民网舆情频道: 体制内正本清源.....	32
广东狮子会: 参与式慈善的领航者.....	33

## 年度人物:

### 艾未未: 知识分子新标杆

作者: 宁二 来源: 南风窗 日期: 2009-12-19

2009年,艾未未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中最活跃的一位。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他策动志愿者持续展开地震遇难学生名单公民调查,并在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前后通过网络定期公布,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巨灾之后生命伦

理和人性尊严的广泛讨论。在艾未未看来，除了地震，更多的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但生命是有价值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

基于上述理念所展开的不懈努力，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的艾未未和他的志愿者们赢得了公众普遍的赞誉和肯定。2009年以前，艾未未的主要身份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但2009他更被视为一位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行动者，甚至是维权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艾未未曾表示，任何一个维权者，同时都在维护别人的权益。他说：“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正如画家陈丹青所言，“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2009年的艾未未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理应具备的勇敢、理性、责任感及行动力，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以能持续进步的动力源泉。

## 胡舒立：传媒变革的先行者

作者：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2009，临近年末，胡舒立离开了她倾注心血11年的《财经》杂志。这是一个结束，一个内情尚未全部披露的突然结束。也可能是一个开始——我希望这是一个继续给我们带来信念和力量的开始，但新航路上的风声涛声已在我们耳畔激荡。

《财经》是内地最优秀的期刊之一，它的内部变局，引起各方关注。有的境外媒体一如既往，从政治着眼，揣度和评论这一事件。但熟悉中国传媒的人会发现，这次《财经》事件，和过往的许多“事件”十分不同。基于中国现实，这个故事可能包含了政治、商业、传媒改革路向等错综因素。对读者和媒体同行来说，这是令人扼腕的故事。有媒体惋叹：“奇迹正在坍塌”；有媒体称《财经》事件显露了“媒体精英理想幻灭的风险”；有网站发布号外：“《财经》已无胡舒立”。

胡舒立辞职，成为媒体的焦点话题。种种议论里，有相同的一点，那便是媒体普遍流露的对胡舒立的尊敬和对中国传媒命运的隐忧。一位评论者写道：“与

其说人们为《财经》杂志和胡舒立的前途牵肠挂肚，不如说他们是在关心这条荆棘小道最终有没有走通的可能性。”

用“荆棘小道”形容中国传媒脚底现实，毫不过分。在这条路上，胡舒立和《财经》已披荆斩棘走过了11年。她怀抱着炽热的新闻自由理想和冷峻的专业主义规则，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要与国际接轨，做独立新闻，定“独立、独家、独到”为编辑方针。胡舒立有一段谈论资本市场的名言，道出她对传媒的认识：“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而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就是公开性的保证。”秉持这一理念，《财经》把严肃的调查报告作为立身之本，勇敢揭露黑幕，挑战强权，解析时局，成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体之一。近日有关《财经》变局的传媒报道，无论党媒体、市场化媒体，都对胡舒立表达了钦佩。人民网转载《长江日报》的文章，称“胡舒立主持《财经》的10年：重新定义中国媒体形象”。

《财经》是中国传媒改革的旗帜。30年来中国传媒的变革趋向，是由非市场化疾步走向市场化，由严密控制缓慢走向宽松。在这个进程中，有的媒体勇敢追求自由，但未能成功进入市场；有的媒体成功进入了市场，却与官商合谋，“听话，赚钱”，质量滑落。《财经》杂志是将新闻理想和市场化运作熔于一炉的罕有范例。它的市场表现不俗，据说2008年利润达6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财经》亦洞烛机先，创办“财经网”，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最重要的是，身为财经类媒体，却不囿于财经一隅。它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高度关注公共政策，难能可贵地“既不唯权力的马首是瞻，也不唯资本的马首是瞻”，奋力探索一条在传媒市场中谋生存、求发展、争自由、做公器的道路。

胡舒立曾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2008年3月19日，她在港大公开演讲。她在结束时的话，仿佛预言了2009年的《财经》变局：“无论是《财经》/‘财经网’这一媒体，还是中国新闻界整体，目前都面临巨大挑战，既包括来自管制层面的挑战，也包括来自市场利益层面的冲击，这牵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国独立媒体无疑是未来最有希望的一支力量，但就整体而言，仍然需要应对现实挑战。”

在迈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一年的时候，我们期待舒立的回应：对挑战的回应，对质疑的回应，对新的艰难险阻的回应。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 伍皓：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作者：尹鸿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自从担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全省新闻工作以来，他一直竭力避免让人觉得自己和别的宣传部官员表现一个样。而为了这样的目标或理想，他在 2009 年经历了太多的争议，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鼓励。

目前，关注“信息公开”和“宣传部新角色”，不能不提及一个人的名字：在“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网友调查团”、在“小学女生卖淫案”中网上实名批评警方工作而声名大震的伍皓。其 199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西藏、云南任新华社记者、政策研究员 16 年，2008 年 12 月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越来越开放的当今社会，要想彻底掩盖信息已经非常难，尤其是在民间力量与官方发生一些矛盾时。伍皓认为宣传部门是党委政府的“形象塑造师”、“形象雕刻师”，应该具有“透明、阳光、法制、责任”的特征。传统上宣传部除了完成党政思想、政策等工作的宣传任务，遇到额外的问题，却总是希望能遮就遮，能大事化小最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信息消防队”。他表示传统的种种做法并不能维护党委政府的形象，有些时候甚至还带来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负面影响，宣传部应该把帮助公众知情作为新的历史职责。

伍皓认为，本来国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希望更好地公布信息，但是现在许多地方却变成了“新闻屏蔽人”，比如媒体记者以前还可以采访具体人员，现在全部被新闻发言人挡驾了，甚至有些地方的新闻发言人还“按照领导需要来发言”，完全背弃了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

随着互联网、手机短信、视频通讯、微博等新传播方式的诞生，公众无论在获取信息，还是参与信息传递方面都越来越简单，大大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时代发展趋势，伍皓提出“宣传部门不能再墨守成规”。尤其随着互联网力量不断壮大，他希望顺势而为，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即每个部门都应该有人负责在网络上主动发布信息，及时解答问题，由于网络虚拟的特殊性，这方面更需要权威性建设，比如政府部门应该公开身份直接回应、直接解决问题，而不是暗中派一批人，用些虚拟网名在网络上发言“引导舆论导向”。

伍皓总结了目前信息公开工作方面存在的三大缺点：一是不及时；二是不全面、不坦诚；三是不实事求是。只要这三方面哪一点没有做好，都将引发公众舆

论的不满，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经常是三大缺点一样不缺。

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伍皓也在积极改变一些“传统习惯”。2009年8月28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和“一小撮”等标签。

最新的事件是：11月21日，针对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的群体性事件，云南省政府新闻办除了及时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外，还开设了国内第一家政府微博——“微博云南”，并通过“微博”在次日凌晨公开发布了螺蛳湾事件进展的权威消息。“微博云南”无疑是全国省级政府第一个应用网络开展新闻发布的平台。

显然，云南省许多宣传、新闻工作改革背后的推手正是伍皓，而这些信息的发布者也正是伍皓背后的云南省委宣传部。伍皓的目标是要彻底改变政府原来对外宣传时效性比较滞后的问题。

“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信息越公开，政府越可爱。”伍皓表示，外界似乎觉得2009年的云南省怪事特别多，那只是一种错觉，原因其实是云南省委、省政府敢于公开问题，不“捂盖子”，舆论监督环境更好。

## 何道峰：理想在世俗的泥泞中演进

作者：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2009年8月14日，正在北京参加“512论坛”的中心主任朱健刚老师给公民社会中心的同事转发了一封邮件，邮件里说：“这次512论坛是北京少有的好的会议，可能会成为历史性的会议，将何会长的发言传给大家看看。”何会长的发言相当长，但句句都在呼应他的发言主题：理想在世俗的泥泞中演进。据说，发言为公益慈善领域的从业者、特别是NGO工作者们注入了强心剂，因为“512论坛”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举办，而在这一年里，曾经在地震初期奔走在救灾前线的NGO们受到了许多质疑，甚至否定……

何会长何许人也？——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何道峰先生，一位来自云南，毕业于复旦大学，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然后“下海”从商、现任昆百大董事长，继而转战非营利领域的多面手。何道峰先生目前还是以志愿

者的身份，担任基金会的执行副会长。

10月21日，我有幸走访了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专职扶贫公益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我原来以为“扶贫”办公楼一定是位于市中心的某栋雄伟的商业楼宇里面，不料它竟然“蜗居”在双榆树里的一栋很不起眼的5层黄色小楼里，而这栋楼原先属于何道峰先生经营的企业的物业。我一直认为“扶贫”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气氛应该比较官方、严肃。但是走进小楼，简朴的办公环境里透出了活力、亲和力，稍稍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工作人员的言行间同样透出活力和亲和力，似乎在用这种活力和亲和力去实践和实现他们的理念：传递爱心与善心，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

据扶贫基金会512论坛办公室主任柏铮老师介绍，“扶贫”成立20年间，第一个10年是摸索期，战略不清晰。第二个10年，也就是何道峰担任秘书长及执行副会长的这10年，“扶贫”进入了改革期，而正是在何会长的领导下，“扶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改革期的第一波“冲击”就是对基金会进行改制，取消了政府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使基金会的人员编制“市场化”，与政府编制脱钩，实行竞争上岗。改制无疑为基金会发展创造了更灵活的空间，然后在此基础上，“管理制度化，做事专业化”形成了第二波“冲击”，这股“冲击波”的核心原则是：

- 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你的管理逻辑；
- 不相信任何口头承诺与保证，只相信合约与监督；
- 不相信纯粹的感觉，只相信数据逻辑与感觉的一致性；
- 不相信永动的设计，只相信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及时性。

正是在此原则指导下，“扶贫”形成了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每一个项目都要经过市场调研、论证、立项、实施和评估的周密过程，而这种专业化操作的最终目的是保证资源使用的效益，全面体现机构的公信力。一系列几近“颠覆”性的改革使“扶贫”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操作型”基金会，运作了“爱心包裹”、“母婴平安120项目”、“小额信贷项目”、“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等有良好的口碑的项目。在和柏铮老师的交谈中，他好几次情不自禁地谈及何道峰先生，言语间充满了赞许和钦佩。他说：“何会长带给‘扶贫’第二个10年的飞跃，第三个10年，我们希望向筹款型基金发展！”

我还无从了解何道峰先生“转战”公益领域时心怀怎样的理想，但是他在“512论坛”上的发言似乎就是对其理想的阐述，发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中国依然处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诸多的社会风险，应该说实现公民社会的理想还有很

长的路，但是我们依然走在公民社会发育的路上，虽然我们在泥泞中行进，但我们依然在前进，这些泥泞中的步伐包含着我们梦想的细碎分子，我们应保持耐心、行动感、责任感合理性。会上我们忘不了要搞一点招标，拿出 1000 多万搞招标，这样我们就能够传承主要精神，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向公民社会方向理性变迁，至于要走多远，咱们也没办法，没有一代人的努力，公民社会不可能实现，全社会实现公民社会的国家也没那么多，中国好在没有很多障碍，没有宗教战争问题。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会走得不错，我还是充满乐观的看法。”

## 秦晓：超越利益囿见的批判者

作者：邢少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作为百年企业招商局集团的掌舵者，秦晓算得上是国企领导人中的另类。

2009 年以来，秦晓对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救市方案显得有些忧心忡忡，认为这剂猛药中带副作用，中长期看会恶化结构失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2009 年三季度经济统计数据一出，秦晓便在外媒撰文，呼吁中央应将积极货币政策调整为中性，避免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这一年来，秦晓或亲自撰文，或在接受访谈时，继续阐述他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观：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一直是在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非价值层面的“现代性”——改变高度集权的政经体制，追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的现代价值观。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让许多人对西方的自由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摇摆，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

他反对全能政府对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认为行政权力与企业的结合会导致不公平和腐败，同时呼吁重启改革议程，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身在国企阵营，秦晓对国企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国企支持者。”他说，“我认为国有企业是遗产，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现在的任务，从微观层面看应当把它搞好。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而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进行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而不是通过控制国有企业进行资源要素的分配，制造垄断，与民争利。

在政府大规模动用财政资源救市，银行信贷大规模倾向国有企业的背景之下，国企阵营作为“既得利益者”，有别于其他国企领导者在公开场合坚持的“国企主导论”，秦晓的呼声已然超越其身份和企业利益的囿见。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让许多人对西方的自由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摇摆，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

一个企业管理者，除了为社会创造财富之外，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呼吁实属难得。秦晓的这些言论和声请，更像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知识分子。

“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或许与他“文革”期间的经历，下过乡，插过队，牧过马有关，对时尚和潮流保持着自己持续的警惕。

秦晓曾当过官员，同时也是经济学博士。从中信集团到招商局集团，外界虽认为他主导了招商局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又一次成功再造，但秦晓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个企业家，他认为国企没有企业家。他也反对对企业过于投入感情，“我从来不认为职业的选择就等于人生的选择，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选择一份职业当成一个责任就行了，如果当成自己的事业、当成你的家那是很可怕的，最后什么都摆脱不了。”

对于那些国企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他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背离了很多基本的理念以及企业面临的环境，或者背离了被时间证明了的一些核心的东西，而单纯地去把爱国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这个企业也会偏离的，我认为摆在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这或许正是他能够超越企业目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将关注视野投向更多公共利益的原因之一。

## 谢辰生：古城保护者的坚强后盾

作者：甄静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谢辰生在文物保护事业上的“终身成就”，不仅在于数十年来书写文物保护法典，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文化名城摇摇欲坠，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处处告急的近 10 年里，本应安享晚年的老先生再次挺身而出，奔走呼吁，全然不顾自己已然罹患癌症。

今年 87 岁的谢辰生从解放前开始跟随郑振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 年进入文物局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后又陆续起草《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截至上世纪 90 年代，新中国绝大多数文物法令的草案都出自他手。1995 年从文物局退下来时，老先生已经 75 岁。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四处告急：北京皇城要拆，无锡要拆，秦淮两岸要拆……每一道拆迁令，每一条胡同的命运，都牵动着他的心。

虽然不在其位，谢辰生还是尽力用个人的影响力为摇摇欲坠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贡献力量：2000 年，他连同 20 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令原定 5 年的北京危旧房改造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下来，保住了大片老胡同；2002 年，起草联名信阻止北京南池子改造方式推广；2006 年，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老城改造每到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听到老先生的声音。

这两年谢辰生身患癌症，健康每况愈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为文物古建保护而奔走的步伐。2009 年，南京城南的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告急，两年前叫停的老城拆建工程再度抬头，城南仅剩的明清街区面临着被拆建一空的局面。老先生心急如焚，4 月刚刚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完癌症例行检查，5 月份甫一出院又开始为此奔走呼吁。6 月间，他在南京一个讨论规划的会议上掷地有声，称地方只重视保护民国大员的洋房，却拆掉明清时代的建筑，是“抓了 70 年，丢了二三百”。

耄耋之年的谢辰生，是中国文物保护志愿人士们最坚强的后盾，因为他一直都在——不是在保护文物的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

## 罗崇敏：推进现代教育公平

作者：尹鸿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一个民族潜伏的最大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教育危机。教育危机是国家最大的危机。”

2008年初，罗崇敏由云南省红河州州委书记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从此让云南的教育工作呈现了新的局面。在有了开头的感受之后，罗崇敏希望把一些个人的思考与理念逐渐渗透到云南省、乃至全国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中，他迅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艰难的现实面前努力促进教育工作的良性发展与进步。

罗崇敏认为要振兴教育，构建现代教育价值体系，必须要进行体制变革。

云南省目前面临着实施全民教育、教育国际化和现代教育价值建设三大挑战：2008年云南的高考升学率仅为47%；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而云南省是6.3年，排名27位；云南高中阶段入学率是52%，低于全国8个百分点，且2009年才完成普九任务，云南的第二次现代化教育进程在全国排倒数第二。

针对这些现实的困难，罗崇敏强调：“云南不应是教育落后的代名词。”

他创新性地提出一项以“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存教育”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基础工程，这项旨在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最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工作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教育部还派出“三生教育”调研组到云南进行调研。

在2009年，罗崇敏进行了多项改革尝试：全省的幼儿园到高中都实现校(园)长公选，另有18所高校校长也进行了公选；灵活办学所有制，大力发展民办、股份制学校，与公办学校进行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并改造了40%的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为股份制学校；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招商办校”、“引资办校”，已成功引入35亿元投资；同时成功组建了20个职业教育集团。

罗崇敏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制造了许多社会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可以用“不公平”来表述。他对云南省初中教育评价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全省统一的初中升学考试，推行学业过程考试，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下令省重点中学云南师范大学附中、昆明市重点中学昆明一中等学校必须每年拿出50%、30%不等的招生比例名额，合理、公平地分派到全省各地区。此前，他还大规模布置了中小学生的“减负运动”。2009年末，云南省教育厅还在省纪委等部门的配合下对违反规定进行补课等行为的校长进行撤职等处罚。

“要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上好的学校。”罗崇敏调研后发现云南省近10年来的22名高考状元和全国24名“奥数”大赛获奖者最后几乎都没有什么事业建

树，深感“教育素质的流失和创造力的缺失已经使国家的教育出现严重危机”。

他认为中国现代教育价值的流失主要表现在学校的官场化、学术的市场化、学习的情场化；教育诚信、教育公平、教育竞争都面临严峻的挑战；教育实践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严重缺失。他于是下决心取消所有不公平的加分政策，仅留下“少数民族加分一项，并将加分由 20 分减为 10 分”，“不再让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权力和弄虚作假混入高考过程里，力图体现考生成绩的真实与公平”。2009 年，云南省高考录取人数比上年增加了 4.5 万人，其中 30% 的学生就读省外院校。

罗崇敏表示自己在 2009 年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没有做”。下一步他将着手对全省的包括幼儿园在内的校舍实施安全工程：对中小学校进行区域布局调整，包括彻底取消一师一校，撤并 500 人以下小学，300 人以下初中，大力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等；并由省财政统一拨款聘请优秀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任教，加大云南与国外教师、留学生的交流数量等。

“教育价值是高于一切的价值。”罗崇敏表示，中国必须建设以人为本的公平价值教育体系，而不能盲目迎合当前的社会需求，自己作为教育厅长，“愿做中国现代教育价值建设的先行者，争取探出新的道路”。

## 王长江：呼吁民主和政改的智囊

作者：廖海青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在各个场合，王长江从不讳言他对民主制度的推崇，特别是在今年，当国家权力在救市的背景下全面扩张、“国进民退”在各个领域狂飙突进时，他提醒全社会“警惕政改麻木症”、“中国到了非大力推动民主不可的地步”。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王长江大声疾呼。

王长江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中央党校一度以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而被称为“马列公园”。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在这个“御用”色彩最浓、与权力的关系紧密到无以复加的学术教育机构，正生发着大量超出旧有意识形态框架的新思想，其中涉及对国家权力边界的界定，以及更广泛的民主与自由理念

和制度创新的论说，而不仅仅是对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

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演绎至今日，已涉入深水区，所面临的诸多内外挑战，绝非念一两句经典咒语就能消弭于无形。倘若领导阶层无意创新、普罗大众无力创新，知识阶层无勇气创新，则危险可知。

但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至。“一旦用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个问题，批评意见就会一大堆，老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王长江说，“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

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的网帖里，王长江回应那些质疑者：“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

针对有人指责中央党校“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他批驳道：“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更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他的逻辑缜密且如刺猬般尖锐，令对手无从下口。

### 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作为一名学者，王长江平时除了读书、写文章、授课以外，还要用大量时间到基层调研，与基层党建工作者交流体会，切磋理论问题。在他看来，那些习惯于抱着书本空对空的理论家们，无论左派或右派，对现实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如来自基层的党校学员。因为学员面临着大量实实在在的问题，他要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学员们的见解甚至比老师还要深刻，学员们披露的社会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王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事的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和探求政党兴亡的规律。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

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1998年王去苏南调研时，那里的集体经营模式已经走到头，企业开始转制。一些工人把企业包下来，从而变身为企业主。

“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按传统观念来解释，私营企业主属于剥削者，剥削者就不能入党。但他们之所以成为私营企业主，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人家按照中央精神去搞经营，反倒没资格入党了。另外，原来已经是党员的人，总不能因为成了私营企业主，就开除党籍吧？那又该怎么对待这批人呢？这就造成了很多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王长江作了一次调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党对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的政策应该调整”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党内有些同志反对得很厉害，中央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后来派人下基层调研，结果和我的结论相同。这样逐渐开始转变，最终在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有了解答。”

王长江认为，研究政党活动规律，必须善于把握特殊性，但亦不能忽视一般性和普适性。“共产党想把事干好，资产阶级政党也想把事干好，没有说上台就想把事干坏的，这里就有共性的东西了。”王长江说。

### 小政治和大政治

他提醒人们要警惕“不照搬西方式民主”的原则成为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践上导致了我们的长期闭关锁国，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只能使我们自己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陷入被动，实不可取。”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王长江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发出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石破天惊的警告，而基层和民间对改革无疑更是充满期待。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需要不断地拓宽，对于国外先进的经验要坚持开放的心态。”

在他看来，改革的阻力关键来自于过去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所沉淀出的各种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不是靠在公正、平等的机会中获得，而是依靠特殊的权力

获得。既得利益者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不义之利，既不需要从全党考虑，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老百姓。因此必须加快党内民主和发展社会民主的步伐，让公众的利益得到更加全面的表达，从制度安排上设计出分离权力与利益的机制，斩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

寄身于学界与宦海之间，王长江的身上却毫无官场习气，在他看来，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小政治。既然你宣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应该从公共利益着眼，这才是大政治。”

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权力染指于一切学术领域，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斥着大量胥吏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

而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定义了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以此观照当今知识界，合乎标准的也许并不多，而王长江或可算其中的一个。

## 陈发树：散财的烦恼

作者：赵灵敏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2009年10月20日，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宣布捐出自己持有的价值83亿元的青岛啤酒和紫金矿业的股权，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这一金额不仅是目前中国内地私募基金会中最高的，而且超过了目前中国内地所有慈善基金会资产的总规模。

对于从事公益，陈发树自称“从小就有这一想法”，他说早在1992年，当时他的全部身家不过百万元，但还是拿出30余万元捐建厦门家乡安溪的隧道。在回答本刊提出的“捐资成立基金会的初衷”这一问题时，陈认为：“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财富累积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责任，对家庭，对公司，对股东，对社会。我个人对财富的理解为生带来死不带去，我财富的累积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得益于社会的帮助。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是我们每个成功企业的责任。”

至于为何捐出的是股权而不是现金，陈的回答是，“现金做慈善用完就没有了，而用股权的形式可以用于投资做到增值保值，这样能让基金会永远做下去。”

尽管如此大手笔，又言辞恳切，陈发树并没能听到多少掌声和喝彩。基金会成立的消息甫一公布，公众的负面说辞便铺天盖地而来：炒作？避税？左兜揣右兜的阴谋？在“国进民退”下自保？花钱洗白减持紫金矿业的税务门？官方主流媒体和有关部门也罕见地介入此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采访时四问陈发树：“是否有避税嫌疑？捐款基数是多少？能否捐给独立第三方？如何处理股票捐赠方式？”

形形色色的质疑和诘问，主要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陈发树的财富从何而来？有无原罪？捐款的动机是什么？如何保证基金会未来运作的独立和透明？

对原罪的追问和声讨，对其背后“不可告人”目的的推测和揣度，这往往是目前公众对企业家从事慈善活动的第一反应。而儿时的陈发树家境贫寒，甚至小学都未能读完，从靠倒木材起家，到现在进行黄金开发、参股旅游，成为 2009 胡润百富榜上排名第 25 的富豪，陈发树缔造了商业神话。在中国不规范的商业环境下，这样一部奋斗史，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谁敢说其中没有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肮脏？而陈自参股紫金矿业以来 9 年 700 倍的收益，是否其中有令人蹊跷的“国退民进”，人们更是不得而知。

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能剥夺陈发树从事慈善的资格。一边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一边大手笔地散财成立公益基金会，这是美国进步时代一些企业家的典型做法。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在聚财时的狡诈和凶残，并不能掩盖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拯救病痛、捐资助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光芒。美国能从资本肆无忌惮的“镀金时代”成功转型，企业家出资设立的形形色色公益基金会的出现功不可没。

今天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从过度崇尚自由竞争、贫富差距过大的时代，向一个更为公平、和谐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公权力的约束、适度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是题中之义，而企业家社会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萌芽和迸发，同样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陈发树的发家过程中有资本原始积累不可避免的“血和肮脏”的东西，其捐资行为起初确有商业或功利目的，其对所捐股权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之处，但并没有改变他捐赠了 80 多亿股权的事实，仅此一点，他就应该得到肯定。

而对于成立基金会是否为了避税，陈发树认为是“无稽之谈”，理由是基金会的申报、注册工作从去年 8 月就开始，但他减持原始股是从今年 4 月才开始的，

两者没有必然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也规定，个人将其所得用于公益事业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 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类捐赠形式确有避税空间，但前提是必须捐赠给国家指定的公募型基金会，而陈发树是将个人财产捐赠给非公募型的慈善基金会，因此没法获得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新华都集团和新华都基金会的管理者高度重合，后者在运作上的独立性和透明度也引发质疑，甚至有人担心基金会会成为新华都集团洗钱的工具。陈发树表示，“我们也在招聘人员，建立档案信息库，能够通过信息库查到每一笔资金的用处并追踪到每个受益人，同时还会每年请审计公司审计接受社会的监督。”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基金会与我国古代仗义疏财的乡绅地主修桥铺路、兴义学、开义仓等等善举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个人的、短期的、有限的行为，一切以出资者的意愿为转移；而“基金会”是一种机制，一旦成立就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受一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管辖，“后台老板”的权威和影响假如有的话也只能存在于创立初期，以后就逐步脱钩。

中国的私募基金会的历史还很短暂，至今没有形成非常完善和成熟的运作模式，公众的种种质疑和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如何保障自己的慈善行为在社会大环境中顺利运行，依旧不容乐观。我们希望，新华都基金会不仅是中国资金最多的基金会，更能成为运作最透明、审批和监管机制最完善的基金会。

## 年度机构

#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维吾尔项目：和谐族群的一盏微光

作者：章剑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12月7日的一次外展工作，25岁的维族小伙艾克被弄得有点狼狈，从中不难看出，“底层关怀”理念要被付诸实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试图抚平族群问题的时候。

### 愤怒的房子

在大兴一个维、汉民聚居区，艾克试图说服一些汉民房主将房子租给维民居住，屡屡吃了闭门羹。

“我们又不是狼！你不用赶我，我不到你房子里去，”40来岁的维族女士美丽开难掩激动，声音颤抖着，“房子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我要是干了坏事，你可以把我赶出去……你给，我们就住，不给，我们就不住。又不是小工，又不是狼，你叫我们走走走，啥意思啊？”

艾克带她去看了一所比较整洁的单间屋子，房主儿子本来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可以出租给新疆人，但房主本人态度决绝，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咣”一声将门锁上，闪身躲避。

这个聚居区里，聚集了100多名新疆人。在今年10月之前，他们全部租不到房子，天一擦黑，就钻入网吧、浴池等公共场所呆上一晚。两个月前，艾克他们进入这里，帮忙找房子，一家一家敲门进去和房主沟通。就这样，好不容易解决了30多人的居住问题。艾克算了一下，30多人一帮一，就可以安置下60多人。

12月7日中午，一位房东找到艾克，投诉刚搬进去一周的维族房客。艾克这才知道，自己介绍进去的原房客未经允许私下将房子转租易手，现在里面住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年轻维吾尔人，语言不通。住进去之后，又招来三四个维族男子同宿。一群人不讲卫生，并且深更半夜在院里劈柴，把房东吓坏了，一边诉说一边落泪。

艾克勃然大怒，把几个蓬头垢面的维族男子全部轰了出来，一边提出增加租金，另找一对维族夫妇接替，一边赔不是宽慰房东，“嫂子，你别哭，有问题了，不值得为他们掉眼泪。我们穆斯林讲究干净整洁、真善美，我们也痛恨这样的人。”

艾克不是房屋中介，而是在京维吾尔人项目的工作人员。这个项目，由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设立，负责人是防治艾滋病社会活动人士万延海。项目旨在帮助维吾尔流动人口获得健康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两项主要的目标，是要使艾滋病感染者获得免费医疗、检测服务，并帮助吸毒者得到政府提供的美沙酮维持治疗。

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须确保流动维吾尔人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和社区，推动

其他民族的人认识他们的生存和健康状况。这类工作有其艰巨性。在大兴那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维、汉民关系一目了然。这些流离失所的维民，如能安顿下来，维吾尔人项目将能对他们进行相应教育和干预，比如美沙酮和一些免费检测，根据当局的规定，只有固定居所并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可得到。这些事务，就都落在了艾克等人身上。

“有时候一天见 30 个房东，谈成的只有一两个。”艾克说。更不顺利的时候，见了 70 个房东，一个也不成，连交谈机会都没有，就被轰了出来。还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对外人对维吾尔人的负面印象。

“这两个月搞得太累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艾克，把找到房子看作是一项挑战，“每次能帮助一个人住进房子，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底层的维族人，过着近似游牧一样的城市生活。早前，北京曾出现过魏公村、甘家口等维吾尔族聚居地，两地先后被驱散了，他们就向更为僻远的大兴集中。这些人当中，有摆小摊儿的、有开小餐馆的、也有做新疆土特产贩卖生意的。美丽开原来就在甘家口开餐厅，现在变得不再富有，一身疾病，连个居所都不稳定。

“北京的人，就是不理解我们……”

在大兴聚居区的维民中，有五六位艾滋病感染者。早些时候，一位感染者去世，直接影响到那一地点的其他维吾尔人。房东陆续解除了租房合同，这种恐慌最终演变成各种误解，将新疆人推向更为边缘化的境地。有些严重的病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新疆去。

项目办为此发出严厉警告，“在京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健康、公共卫生等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限制和排斥该群体的最基本生存和居住权利，是不应该的。”

### 突发事态

2006 年，有人建议万延海到北京西站地区的维吾尔人聚居区看一看。当时他了解到，那些地点注射用针头遍地，连小孩儿都在玩针头。随后，他们向全球基金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申请资助，设立了维吾尔人项目。这两个组织，都有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干预专项资助。

“也挺害怕的，因为完全陌生，不了解，”万延海说，“能躲的也想躲。我们的更多精力，是做能做的、熟悉的和安全的事情。”维族项目已经在北京和昆明两地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民族大学等一些高校招募维族学生担当志愿者，并将这些人派往各个维族流动人口聚集场所，通过联谊、咨询和培训等外展工作，向维吾尔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医疗转介服务（免费检测、清洁注射器交换、美沙酮治疗等），也通过与官方进行沟通

和交涉，帮助他们取得某些基本的公民待遇。就项目本身来说，他们也会对维吾尔人进行一些物质帮扶，比如给予贫困者基本生活资助、协助无力承担丧葬费用的感染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等。

维吾尔项目原来有7个专职工作人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每月拿着1000多元生活补助，不长时间就陆续离开了。现在的3个维族青年，像艾克这样，有的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如果不遇到重大变故，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遇到一些重大节庆或事件，很多工作会陷于停顿。

“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艾孜提说，“社群里有各方面的需求。”

艾孜提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早些时候，爱知行与一些高校社团建立过合作关系，也资助过中央民大的一些学生赴新疆支教。毕业了，她就向爱知行求取了这个职位，担任项目专职人员。但像找房子那样一波三折的工作，并非女孩子能够胜任，于是就都交给艾克一个人天天去跑。

维吾尔流动人口的不固定和周围环境的变动，给项目工作带来了难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社群志愿者，可能由于一些意外情况而从此失去联络，此时，社群联系就会出现断档，需要重新培养。他们所关怀的，始终是不不断切换着的陌生面孔。

“我们不能保证永远做下去。对于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也许是多余的工作，本来这就是他们管的事情，”艾孜提的同事、南京大学毕业的女孩热依莱说，“如果政府尽职尽责，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维吾尔人的民族污名化和社会歧视处境。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维族流动人口的第三方帮扶力量出现，这些维吾尔流动人口，只怕真会成为美丽开所说的那样，是“睁着眼睛的瞎子”。相应地，对艾克们的到来，他们寄予了过于沉重的期望，有些事情，完全是艾克等人力所不能及的。

这个地点据称已经写入政府的规划，最迟在明年春天就会夷为平地，居民们需要迁离，而那些没有房子的维吾尔人，又要走上一条未知之路。在此之前，这个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视线之外的社会，将一直保持着它的本来面貌。

12月7日午后，聚居区内冒出一个四处找白粉的汉民男子。这个瘸着一条腿、口齿不清的男人，在扫完一条街后，一无所获。接着进到一家维民开的小卖部里。当时艾克正和店主夫妇交谈。听说要找白粉，店主和艾克同时厉声警告此人离开。“赶快出去，别影响人家做生意，”艾克说完，转而向本刊记者叹气，“这又要引起误解了。”

傍晚时分，聚居区里还发生了一起维、汉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一群汉民举着棍棒和长长的大砍刀，把手里端着一把菜刀的一个维族男子逼进胡同里。人越聚越多，对峙一阵后，又各自散开了。这功夫，艾克大声喝斥了一些维吾尔人，

一位妇女和他申辩了几句，艾克挥挥手，示意她赶紧离开。

这件事情让一直小心翼翼处理社群事务的艾克感到忧虑。冲突可能激化矛盾，加深误解，使他们的帮扶工作前功尽弃，维吾尔人将更难从汉人那儿租到房子住。但他又不无侥幸，觉得事情发生时正好天色已晚，事态也没有扩大到整个聚居区。

天黑了，奔忙了一天，艾克准备返回市里。那个被围攻的维族男子找来，向艾克说明刚才的冲突原委。他的脖颈处有两条被砍开的伤口，正在渗血，皮衣的左肩处，也被砍出两条长长的刀痕。艾克要求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去诊所包扎伤口，什么都别想。他答应明天过来再协调此事。一路上，他为两个月以来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局面被打破而遗憾。

摆在维吾尔项目面前的，是更为现实和纠结的族群矛盾，他们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妥善求解这个难题，绕不开，也回避不了。这决定了项目本身——一盏点了3年的微光，能否变得更明亮一些。

## 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守夜人”

作者：孙海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随着改革开放渐强渐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作为执掌财经立法大任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其角色和地位日益凸显。

全国人大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不断出台。如《物权法》，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被认为是从法律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催生了一些新的法律：通过《企业破产法》；修订《合伙企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这些法律的出台，财经委专业人士的献策功不可没。

在推动预算审查方面也不遗余力，全国人大财经委除了审查汇编的中央预算草案之外，还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分预算。2000年需要审查的分预算的部门数量是4个，2007年增加到40个，在2008年增加到50个的基础上，2009年则增加到107个，以后还会增加，直到囊括所有的中央部门。可想而知，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审查工作是多么繁重。

为了让每一笔中央投资落到实处，2009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启动“对中央政府部分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实施情况专题调研活动”，选取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农田水利建设、教育卫生等民生工程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4个题目开展调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开创了以重大专题调研的形式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先河。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参与这4个专题调研的同时为了给政府投资把关定向，防止重复建设和城市盲目扩张，确保中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保稳定等一系列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还单独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对部分政府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开展专题调研。

### 清醒的质疑者

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始终感到忧虑的是天量信贷资金的三个问题：一方面是在关注巨额信贷资金是否进入了实体经济，是否能对“保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贷款的高增长是否会给银行经营带来风险，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从更深层次角度考虑，在目前外需持续萎缩、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问题日趋明显，单靠信贷推动投资，进而拉动经济的模式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调结构落实为2010年工作重点时，回过来检视发现，早在2009年4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官员已经在呼吁调结构的重要性。

靠短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扩大需求，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样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存在着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结构性问题。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是“内生性因素为主”。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外部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方式问题 and 经济结构矛盾。

尽管中央提出了“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但从实践中看，许多人还是认为“保增长”与“调结构”二者之间有矛盾，在实践中很多地方也是固守着“保增长”，对“调结构”不够重视。

“就局部来说，从短期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可能会影响一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远来看，保增长与调结构是一致的，调结构是保增长的应有之义。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使增长更有可持续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

最先质疑信贷政策的危险后果的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官员。前央行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早在7月就表示，要正确理解和贯彻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适度的货币信贷能够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过度的货币信贷投放对社会而言不是福音。

以投资为单引擎，信贷为推动力，或许能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燃眉之急，但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好转，还需要治本的良药。“不采取货币信贷总量控制的措施，将埋下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吴晓灵警告说，要避免建立在经济结构失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用投资来替代外需下降，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极易引起中国经济在旧结构上的增长。政府应该做好就业工作，安排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控制好货币的总量。

前海关总署署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牟新生则连续炮轰 GDP 政绩观，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在“调结构”、“扩内需”上下功夫，而一味追求投资拉动，甚至加大产能过剩行业的重复建设力度，这种发展思路恐怕难以为继。随着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强化，以及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贸易出口高速增长的现象不会再出现。同时，随着投资过度扩张，不少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过多地追求 GDP 增长率，对此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

除了中央财政的巨额赤字，地方政府的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更值得担心。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大规模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各种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及各种“银信证”产品，把地方政府进行基础建设投资和其他政府活动产生的债务信贷化。这些资金大部分使用在自偿能力低下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之上，给地方留下隐形赤字和债务负担，造成财政结构性风险。对于政府项目的风险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韩寓群副主任表示，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问题，现在各级政府的资本金不是很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大量的银行贷款被作为项目的资本金，风险是比较大的。其次关于政府大幅举债问题，目前各地依靠政府的信誉大量融资，一些地方重视投资总量的增加，而对投资结构是否科学合理重视得不够。一些地方对部分项目投资规模很重视，而对投资效益、市场竞争、促进就业、投资成本的回收研究得不够。这些已经出现或潜在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可能会对金融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 期待财税突破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在经济立法领域深化的同时，对于固化中国既有经济模式的财税体系，却并没有承担起社会所期待的责任，在这一领域

与传统形成的利益切割显得尤为紧迫。

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现有 20 多个税种，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都是通过国务院制定的条例生效。这种情况的产生，源于 1985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该授权没有明确具体的立法领域和时间限制。根据这一授权，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暂行条例，制定和征收赋税几乎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权力。

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制定和应用法律管理经济的大量经验，继续无特定目的、特定范围、无时间限制的授权已经完全没有必要，继续授权无异于人大在经济领域的全面放弃。这种将税收立法权授权行政部门的做法同样也有悖于国际惯例。中国这种行政主导型税制，容易导致政府规模的无限膨胀，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要求扩大税收，二者相互影响。由于对政府机构设立和人员编制没有法律约束，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 7000 万人，官民比例高达 1：18。这也是中国存在大量税外政府收费的根源之一。但是，目前人大回收税收立法权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人大本身收回税收立法权尚需更大动力；二是行政部门却有维护其税收立法权的动力。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认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因为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

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根本革新，舍此没有更好的出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

很显然，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中国未来税制大变革中应该承担更为重要的应有之责，收回税收立法权，规划符合中国实际的税收的民主化之路。

# 慈济：台湾民间力量典范

作者：钟岷源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今年8月，莫拉克台风袭卷台湾南部，与马政府迟缓的救灾动作相比，台湾民间组织再次显示出优于政府的行动力，这当中，慈济基金会的志工们和10年前9·21地震时一样，仍是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一群，他们的身影总是率先出现在救灾和重建的第一线。

由于慈济做得太好了，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负责为灾民兴建部分临时住屋的台湾军方，还下令要士兵们日夜赶工，赶在慈济人的前头，将简易屋建好。一个民间的宗教慈善组织，如此庞大及快速的动员力量，在如此严重的大灾难中，让政府相形失色，令慈济人与众不同。

“慈济名副其实地是台湾民间力量的典范之一，也是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许木柱教授在电话那头颇为自豪地告知本刊记者。

被誉为“台湾的良心”的慈济，其前身是“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由证严法师在1966年4月14日于花莲创立。1994年，慈济基金会在台湾“民政部”注册，基金会有四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其经费完全来自民间，志工也是各项服务方案的主要执行者，40余年来，他们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慈善工作。

1991年华东、华中特大水灾时，慈济便已进入大陆开展赈灾工作，去年2月27日，国台办正式批准在大陆成立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慈济由此成为首个由非大陆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民间基金会。十几年来，慈济在大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慈善活动，去年川震时，慈济的志工们同样冲在救灾抗灾的最前沿。

## 社区志工

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大地震。慈济竟然在48秒内做出反应，这是当时慈济功德会创下的纪录。灾区居民发现，最先到达灾场、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正是慈济组织的志工。在大地震发生后短短数分钟内就能赶到灾区了解情况，主要缘于证严法师在1996年推行的“社区志工”制度发挥的功效，更重要的，则是慈善济人奉行的“同体大悲”和“无缘大慈”精神。

许木柱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所谓“社区志工”，即为慈济的志愿工作者，平

时为自己居住的社区提供服务，一旦发生重大事故，这些志工便会互报平安，将各区信息传达到总部，并主动往需要协助的地方集合。现实的情况是，这种化零为整和自发性的动员方式，就是慈济能迅速为灾区民众伸出援手的有效做法。

同样的，2004年印度尼西亚地震期间，一位男性受害者的家人全都遇难了，因为悲痛万分，一周食不下咽，正是通过慈济的志工，心情才得以逐渐平复。去年5·12汶川地震时，慈济以最快速度派出两批志工到达成都，奔赴救援地点。首批志工是来自福建、昆明、山西等各个省份的台商，另有13位台湾当地志工从台北桃园机场飞抵成都。

1991年，慈济到大陆救助华中和华东大水灾的灾民，以及赶赴南亚孟加拉国援助重建洪水灾区，则是慈济参与海外救灾活动的开始。至今，慈济的赈灾活动已遍及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多个国家。经过40多年的发展，慈济已经从当年30名志工的佛教慈善组织，成长为一个海内外会员700万人的全球性慈善机构。单在台湾就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志工约3万人。现在她的慈善事业几乎遍布全球，每天有近100万的义工在世界各地为大众服务。

慈济与国际性慈善机构合作，积极参与海外救援工作所累积的经验，也是慈济人能在震后迅速组织起来，展开有条不紊救灾工作的要素。”身为慈大的教授，许木柱对慈济救灾的运行机制研究甚深。

他对本刊记者说，“安身和安心是慈济目前进行救助的主要方式。两者同时进行，前者集中于抢救伤者，后者进行精神上的抚慰，除了物资帮助外，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心灵抚慰。”

对此，证严法师表达的理念是：“天下事不是一人做的，而是大家一起共同成就的；天下事不是一时做的，而是一人接一人，一代接一代，相继完成的。”

### 骨髓捐赠

慈济的助人行为，不能少说了他们的骨髓捐赠。

这些年我们屡屡听到台湾骨髓捐献活动，每年大陆有无数的白血病患者，因为得到了台湾慈济骨髓中心的帮助而获得生命的延续，这个慈济骨髓中心正是由证严法师亲手创办。

许木柱告知本刊记者，基于“尊重生命”的理念，证严法师不忍心血癌病患及家属苦候亲属间骨髓配对相符的煎熬与失落，1993年，慈济骨髓库成立。如今慈济的骨髓数据库，已累积捐赠者数据的人数达30多万人，是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三大的骨髓数据库，也是志愿捐赠比例最高、拒绝率最低的骨髓库

据悉，慈济骨髓库已转型为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除了持续加强骨髓库功能外，也发展干细胞研究、基因治疗，并筹组脐带血库，预定3年内募集一万笔脐带血，作为骨髓配对的第二道防线，万一骨髓配对不符，还可进行脐带血干细胞配对。

事实上，骨髓捐赠的善举也是证严法师实践其“普天三无”理念的具体体现。她说，“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同时她也推崇这样的志业：“从慈善开启医疗，而由医疗开启教育，又从教育而启人文。”“慈善是人类希望、医疗是生命希望、教育是社会希望、人文是心灵希望。”

### 公开公正

出家本来是为逃避名利，但证严法师对“金钱”有了新的诠释——钱可以用来救人。

慈济每年收到的捐款已以亿计算，但它的每笔捐款，从几块钱到几千万元，都条列得仔仔细细，绝无分毫闪失。这般公正诚信，确是感动了无数心存善念的人们，纷纷解囊，共造慈济福业。

有人曾统计过，仅以一年为例，台北市政府所发出的救济款项总数是3000余万元台币，而慈济单是救济一项，就付出了2.4亿多元。

“一公而万事易，一私则万事闭。”任何组织都有建立公共信誉的重要追求，慈济作为非盈利组织急需公共信任，商业组织同样如此。只有做到公开公正，才能得道多助，理直气和地追求阳光下的利润，无论是对企业外部还是内部，公开公正都是极其必要的。

为此，许木柱很是肯定地说，“慈济的每一笔捐款都有会计师的认证，具有公信力，影响力的遽增与这种公开公正密切相关。”

一般的佛教界劝募善款通常都是通过黑盒子，得来的善款往往不知去向，人们难免会有种种质疑。而证严则完全不同，她连静思精舍的产权都是由俗家母亲协助与自己贷款买下，然后精舍师父们自力更生工作，分期偿还银行，一切自食其力，绝不收受信徒分文。一切捐款点滴归慈济基金会，帮助苦难众生。一切钱财的用途，证严都会完全交由董事会来共同决定。因此，善款的使用得到最佳监督，获得海内外社会大众的信任与支持。

### 环保观念

“知福、惜福、再造福”，是慈济人在生活层面所遵守的观念。

证严法师并不赞同人们平时生活中的过度消费，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但“消福”，而且也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她提倡“资源回收”、“废物再利用”等观念，更呼吁慈济人勇于献身环保任务。从1989年至今，海内外慈济人抱持“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的信念，从个人环保做到居

住小区环保，当前超过 2 万名环保志工长期在居住小区做资源回收。如果以制造 50 公斤的纸，需要砍伐一棵树龄 20 年的大树来计算，慈济环保志工在一整年回收的纸量达 6 万多公吨，可以拯救近 150 万棵的大树免遭砍伐。

许木柱对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的细节，慈济人养成了“惜福爱物”的习惯，他们利用太阳能发电、四周铺设连锁砖，设置资源回收桶，雨水及废水回收再利用；在花莲慈济医院雨水回收系统，每年为医院节省 350 吨水量、194 千瓦电量；地面铺设连锁砖，让大地能够呼吸；E 化电子公文，节省纸张浪费；还有不冲洗 X 片的医疗图像处理传输系统，都显示出慈济疼惜大地、落实环境保护的决心，使地球上的资源能永续利用。

应该说，源自佛教的慈济，倡导并遵循这样的理念，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 20 世纪结出的硕果，台湾慈济，不仅是当地民间力量的典范，亦为世界民间公益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优秀模式。

## NPI：架设公益桥梁

作者：甄静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不是一个基金，它本身没有钱；它也不是一个直接针对受益人的公益组织——创始人吕朝给它的定位是“公益链条里的一道桥梁”——这种定位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国内很罕有，甚至国外也不多。

2007 年，NPI 在上海浦东成立，推出的第一个项目是“公益组织孵化器”。提到这个项目，吕朝推荐记者看他的一篇文章：《新民营运动》。文中他提出一个基本想法，认为中国公益组织的发展跟以往的民营企业发展一样，应该先发展增量，只有增量发展起来以后，才能促进存量的改革。

NPI 自己并不针对受助者做具体的服务项目，在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里，其旨在为初创期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关键性支持。

“我们主要选择那些对于社会问题有一些新的创意，但还处于组织创办最初期，能力比较弱的新型 NGO。他们现在的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注册比较难，和资源之间的渠道不畅通，很难得到社会的资助。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能力建设。”

对于通过了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考核的 NGO，NPI 给他们提供办公场地、办

公设备、用作工资的小额补助，通过十几门课程让他们掌握与初创期 NGO 匹配的能力，同时帮助他们跟政府沟通，解决注册等问题，让优秀的项目和组织赢得时间和机会去成长，探索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个项目 2006 年设计成型，从 2007 年开始在上海浦东开展，继而扩展到北京、深圳、成都，已经成为 NPI 最广为人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成功孵化出包括西部老年联合会、优爱助盲协会、手牵手心理关爱中心、企业公民在行动等 15 个已出壳的公益机构。

而相较之下，更能体现 NPI 在公益链条中桥梁作用的，还有另外两个正步向成熟的创新项目——公益创投项目和“公益广交会”。

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的“公益创投”大赛里，一个个公益组织负责人在电视观众前充满信心地接受着社会学学者、街道干部、企业家等专家评审团的盘诘，彼此间展开了激烈的 PK——这就是今年由上海市政府出资 1000 万，交由 NPI 托管运作的“社区公益创投大赛”电视赛场现场。

吕朝告诉记者，与公益组织孵化器相比，“公益创投”针对的是相对成熟，有能力吸收大一点的资金的公益组织和项目。NPI 以类似风险投资的综合评估方式来进行遴选，找到有潜质的 NGO 和项目，给予较大笔资金的支持。

“不过资金并不是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由我们的合作资助方比如基金、企业等提供。我们其实是资助型组织及需要资助的执行机构之间那一道沟通的桥梁。”根据吕朝介绍，NPI 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三大块。

一是各级政府，既包括上海这样的市一级政府，也包括区一级政府（如北京西城区），以及一些街道政府。二是资助性的组织，如国际的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国内的南都基金会等。三是与包括联想集团、康师傅等企业的合作。

2007 年 12 月最早与 NPI 在北京启动“公益创投计划”的是联想集团，聚焦于“缩小数字鸿沟、环境保护、教育、扶贫赈灾”四大领域，收到了上百家公益组织提交的申请。最终，包括“多背一公斤”、北京甲骨文都市女性俱乐部等 16 家 NGO 脱颖而出，得到联想为期一年的“能力建设”以及每家 10~20 万元的资金支持。

到了今年，NPI 在公益创投上的新突破尤令人欣喜——除了跟企业合作外，上海市政府也拿出了 1000 万，交由 NPI 运作社区公益创投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社区服务的创意金点子和操作方案。在这个大赛中获胜的社区服务项目都会获得 5 万~20 万元的创业投资奖励，用于项目启动或扩展。

一方面，虽然政府投入社会建设上的钱很多，但如此大规模地由政府动用福利基金投资于民间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在中国公益事业史上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公益创投大赛登上荧屏，把公益机构、电视 PK、项目创投等新元素糅合在一起——这无疑是进行公益人才和公益组织评选的首次创新。

与“公益创投”大赛同期，8月NPI在北京推出“公益广交会”，模仿广交会形式，把公益领域的“买家”（资助型机构、企业等）和卖家（草根NGO）都放在一起，解决公益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今年我们在北京做，明年将利用世博的机会在上海做。”吕朝说，希望NPI成为一个社会公益的创新引擎，发挥公益链条桥梁作用的同时，能给国内公益领域不断带来新气象。

##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不唯学术，锐意争鸣

作者：谢奕秋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中国选举与治理”是一家致力于探索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英文网站，由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与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于2002年创建。从其选稿情况看，兼具即时新闻评述和对中外选举、治理制度的理论探讨，而该网站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几乎每篇被推荐的主文之后都有大量注册用户的跟帖，且观点新颖尖锐，立场出奇地一致，不会出现天涯网一类大型综合论坛上口水、板砖漫天飞的场景，也不劳网友挥刀自宫、削足适履以将回帖发出。

在中国特殊的网络环境下，“中国选举与治理”能保留这样的言论空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它的美方背景。说起来，卡特中心1982年在亚特兰大创立，主攻“解决国际冲突，推动民主和人权，帮助消灭贫困、饥饿和疾病”等课题。近些年来，卡特中心与中国民政部合作实施了特种教育、村民选举等项目，效果不错，卡特本人曾宣称“中国农村选举完全自由”。具体到涉及敏感题材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因为卡特1978年的建交决定使中共一定程度上有了领导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技术转让和资金来源，所以有关部门对这样一位“亲华”前总统在中国的NGO项目总要给点面子，何况，该网站创立者刘亚伟也不是等闲之辈，学

贯中西，知所进退。

选举与治理网没有商业压力，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比如在“征地拆迁”这个三级目录下面，关于唐福珍的时评就达 20 条之多；在网站内页推荐阅读的文章中，既有冷门的顾准、林昭等“知识分子最爱”，也有杨尚昆、李瑞环、罗瑞卿等当代前政要的轶事，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闻媒体的空白。值得玩味的还有它评述国际热点的角度，例如吴稼祥的文章《哪种暴力害了菲律宾？》，转到选举网上时标题变成了《〈环球时报〉对民主的恐惧》。

选举网自称是“纯公益性学术网站”，有个栏目是“学术与争鸣”，在它的二级目录“学术论文”库中，洛克、齐泽克、孙中山等历史人物是常被提到的字眼，“学人文集”则搜罗约 200 位名家的作品，但这些文库的阅读率显然赶不上另两个二级目录“百家争鸣”和“观察与思考”里面的人气。同样，在平行的几大栏目中，包括“人大聚焦”、“党的建设”、“制度创新”、“法律法规”等都存在比较多的官样文章，反倒是“国外选举与治理”和“图书资料”因对接了国外信息资源而显得生机勃勃。

与天益学术网等诸多冠以学术名号的社科类网站相比，选举网可谓“不唯学术，锐意争鸣”，其读者之间互动性强，往往主文一本正经的官腔或自我标榜，被几篇跟贴调戏得体无完肤。学术要靠时评帮衬人气，这或许是网络阅读时代的传播规律，但作为选举网的拳头产品，“中国选举”和“中国治理”这两个栏目做得非常专业细致，能够让你在烦腻时评的脑残体之后，恢复对于真问题研究的尊敬。

倘若你是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徜徉在这个具有不羁浪漫气息的小站，你会有一种周身解脱、相见恨晚的感觉，正如该网站自我介绍中说，它是“为中国政府官员和海内外学者提供一个信息库、一间阅览室、一个交流站”，“欢迎各位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上网‘走走’”。

## 广州市财政局：预算公开只是开始

作者：赵灵敏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10月16日，广州市财政局在“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组织的申请下，将2009年广州市本级114个职能部门的预算全部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此次公开账目的内容庞大而详细，涉及财政资金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广州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是怎样花的，花在哪些地方，这个“账本”基本可以解答。

对于纳税人来说，政府预算本不该成为什么秘密。因为纳税人有权利知晓自己所缴税款的去向，因此将公共预算向全社会公开，是本来就应该有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额外施恩。但在各地对政府将预算秘而不宣、以“保密”为借口将纳税人政务公开的合理诉求拒之门外的现实语境下，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114个部门的预算，并非易事。

今年8月份，河南省南阳市青年王清对当地181个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主要是想获得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信息。他没有获得一个部门的“有效答复”，一度还曾被当成了间谍。“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组织还向其他30多个单位提交了公开预算申请，都遭到了拒绝：上海市财政局的回复是“不予公开”，说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深圳福田区财政局的回复亦是“恕不能公开”。

因此，市民、各地网友、人大代表、财税专家大都为广州财政局敢于向老百姓“晒”账本叫好，但在赞扬之余，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抱怨看不懂预算，“专业性强、内容复杂、数字一大堆，看到蒙查查”，至于预算是如何编制的，论证是否依据充分，更是无从知晓；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的“公款招待”、“公款出国”等被完全湮没在“行政运行”或“其他支出”之中；9间政府机关幼儿园一年获得6000万元财政补贴等等。

显然，预算公开是好事儿，但公开不是一切。没有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公开性，没有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和监督，预算公开就难以起到防范腐败的作用。公款招待、出国的费用，虽然在现行的预算制度中没有单列，但积极改革现行的不合时宜的财务管理制度，让那些受权力遮盖的秘密消费真相大白，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而早在2004年广东省“两会”上，几家省直机关幼儿园预算过高的问题就引起过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上，广州市两大机关幼儿园预算超千万的新闻就已经披露，但在“两会”代表委员以及市民的众目睽睽之下，预算还是顺利通过了。这样明显不合理的预算是如何形成的呢？又为什么能够经由人大审议通过呢？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

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结束后面对中外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在中国 2000 多年的王朝政治中，没有人意识到国家有必要向老百姓交代财政支出的账目。只是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遭到挫败时，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才看到西方财政制度的优越性，满清新政因此试点编制预算并公开预算，而到了 100 多年后的今天，政府的财政预算居然在很多地方仍被堂而皇之地设定为国家秘密，能不令人扼腕？而与预算公开相辅相成的有效审查和监督，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因此，我们在赞赏广州市财政局公开预算的勇气和决心之余，更大的期盼是，预算公开的大门最终能通向政务公开和民主化的康庄大道。

## 人民网舆情频道：体制内正本清源

作者：赵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众所周知的人民网自创办至今已经 13 年了。《人民日报》的背景决定了它在传达高层意向信号和反映民意方面的独特地位。而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人民网舆情频道正式运营。它是主流网站中第一个舆情专业频道，收入了几百家 BBS 和意见领袖博客。面对既要反映多元化网络舆论格局又要增加舆论引导的有效性的转型课题，舆情频道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强国论坛”是人民网第一个知名品牌，而舆情频道的“舆情会商室”则成为舆情爆炸年代的一股清新的力量。2009 年强势介入灵宝“跨省抓捕”王帅案、石首骚乱、绿坝软件、矿难、官煤勾结与媒体封口费、番禺垃圾燃烧发电厂事件，并组织汶川大地震与传播媒介系列访谈。比如，在王帅案中，王帅处于取保候审状态时，于秘密地点上网，在“舆情会商室”接受了访谈。灵宝官方最后也派出政府发言人选择舆情频道公开道歉，可谓是十分少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舆情爆炸年代，体制内网络媒体必然要超越一些传统做法，才能获得公信力。人民网舆情频道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石首事件后，在《人民日报》评论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石首政府应对失当的当天晚上，舆情频道组织两位群体性事件专家、两位媒介专家进行舆情会商，提出政府已经进入“麦克风时代”（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

主体，就像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这个提法被广泛引述。《人民日报》评论和这个访谈，被认为是石首事件拐点。

人民网舆情频道 2009 年还推出了三个排行榜：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中国境内企业舆情排行榜、网络流行文化排行榜。在第三季度舆情热点事件中，上海“钓鱼执法”政府公信力最低，杞县因为封锁钻 60 “卡源”事故导致举县民众出逃，却抓捕网民以泄愤，政府综合应对能力居末。排行榜发布时，上海方面尚未正式承认钓鱼执法。这表现了一种干预现实的勇气，由此也得到了各大门户网站和 BBS 的强烈呼应。

在国内人气最盛的天涯社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部和冰点周刊，中央电视台“新闻 1+1”栏目，开设“主流媒体”频道，发布官媒报道和评论，与网民互动，推动传统的官媒触摸和吸纳网络民意，并让官媒的声音为广大网民所了解。这种探索也值得肯定。事实上，人民网舆情频道和一些著名的商业性论坛/BBS 保持着舆情监测业务联系，与一些温和理性的“知名网友”交流也十分频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即将出版，其中 2008~2010 年《互联网年度舆情报告》由舆情频道的人士撰写。报告被视为中国网络民意的风向标。

《人民日报》、人民网通过人民时评、强国论坛、舆情频道等，落实中央关于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指示精神，回应网络民意，作出正面解读，体现了体制内正本清源、激浊扬清的努力。对于 2009 年的网络问政，既有“人肉搜索”挖出的贪官周久耕案的宣判，“跨省抓捕”网民案的纠正，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回过味来，把网络举报打成网络诽谤。负责舆情频道运营的《人民日报》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王帅案会不会成为极为侥幸的例外，而吴保全案则成为常态？”

## 广东狮子会：参与式慈善的领航者

作者：赵灵敏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2-19

提到慈善，人们就会想到捐款，一般的慈善机构，也往往是从社会上募款然后自己去做慈善，捐款的人一般并不参与具体的慈善活动。但成立于 2002 年 4 月的广东狮子会，却秉承“我们服务”的理念，要求捐款的会员亲自动手做志愿者，提供服务，亲身体验从寻找需求、进行选择、筹款、执行、验收回访在内的

一个完整的慈善行为，从而直接感受自己努力帮助他人改善世界的成果。他们的一个不曾公开的口号就是“把老板改造成志愿者”。在国内的公益组织中，这一点绝无仅有。

2009年，广东狮子会为7000例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做了白内障复明手术；为1500个孤儿提供了生活和精神上的帮助；台湾“8·8”水灾后5天，广东狮子会就筹款300万台币到高雄县，并两次派志愿者前往；在广东全省送出5000台盲人声讯电话机，该电话机除了可拨打固定电话外，还可提供电台节目、残疾人法律法规、股票知识和行情等内容，需要电话机或读书机的盲人，话机上还有盲文及有按键链接到声讯服务台；组织了有4万名儿童参加的国家和平海报比赛。

除此之外，广东狮子会坚持多元化的做法，“每天都在行动”，其活动的内容涉及多个领域：环保、扶贫、助学、赈灾……

作为国际狮子会的一员，广东狮子会借鉴和吸收了国际狮子会的管理模式、理念和精神，同时坚持独立办会。国际狮子会拥有130多万分布全球的会员，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服务机构。作为一个超庞大的机构，狮子会能生存并持续发展了91年，其组织方式和管理规程自有众多精妙所在。例如狮子会领导岗位的年度更换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追随者成为领导者，也让领导者学会角色转换成为追随者；像大会主席制，让更多的成员担负独立组织项目的责任并得到更为充分的锻炼。

对于狮子会会员来说，在这样一个能人荟萃的地方，如何做好团队的民主与凝聚、目标的确立与执行、岗位的分工与协作、角色的领导与被领导，都能找到极好的实践和锻炼的机会。

目前，广东狮子会的会员以每月100人的规模在增加，而在其已有的1000多个会员中，有至少200人参与狮子会活动的时间超过了对本职工作的投入。很多狮子会会员，以前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做着善事，而在认识狮子会后，才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可以安心信赖的“服务之家”。

完